

#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衝擊

邱貴玲

## 摘要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實施以來，對我國的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有了劃時代的影響，不僅整合了現有的防治資源，提升了婚姻暴力的社會意識，也帶來了許多衝擊。本論文以第一線工作的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社工員為對象，探討家暴法實施以來，在不同層面工作的影響，和未來有仍待努力的發展方向。論文研究發現，執法人員的支持是社工員救援受害者脫離暴力環境的重要關鍵。相對的受害者能否經濟自主也是建立新生活的關鍵。論文建議，未來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應以擴大資源整合為目標，以減少救援工作的困難度，並從而增進婦女獨立生活的能力。

關鍵字：家庭暴力、婚姻暴力、社會資源、目睹兒童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impact of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on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in Taiwan. The Act came into force in 1999, and has been a major legal foundation for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in Taiwan ever since. The author interviewed the front line social workers involving with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Using the interview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1) how the Act has changed their role and their work, (2) how it has helped developing the prevention network, (3) how it has integrated current public resources to build up the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network. It found that the Act has many positive impacts on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However, since it is only in force for less than two year, there are many aspects for future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policy-making consideration.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最近發表了兩部婚姻暴力宣導紀錄片，第一部名為「勇氣」，由婚姻暴力的受害婦女敘訴自己如何走出婚姻暴力痛苦的親身歷程。另一部名為「我的願望」由曾目睹母親遭受婚姻暴力的兒童或青年回憶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暴力對他們的影響。在「勇氣」一片中，兩位如今已獨立生活的婚姻暴力受害者，以親身經歷形容自己當年如何天天活在無限的恐懼中，除了無盡的暴力虐待外，一名施暴的丈夫為了控制妻子的行動自由，甚至還將她全身衣物剝光，讓她無法出門。在受害者聲淚俱下的控訴下，婚姻暴力的恐怖事實，活生生的浮現在世人眼前，令人同鞠一把眼淚。另一部除了婦女自己受虐外，更令人心痛的是，許多婚姻暴力家庭長大的目睹兒童在母親的哭叫聲，父親的打罵聲中，無奈的走過童年，既無法保護自己的母親，也不知如何對抗父親的暴力，「我的願望」中，這些在暴力環境中長大的兒童代表了婚姻暴力悲劇裡另一群無辜受害者。

這兩部影片是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推動以來公權力致力宣導防治婚姻暴力的又一例證。自從「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於民國八十七年通過，八十八年正式實施以來，包括婚姻暴力在內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規劃系統，各項分支的防治工作如通報、救援、庇護、安置、申訴等也有了明確的責任分工和司職單位，社會上存在已久的婚姻暴力有了確切的法律規範和依據，各種防治服務工作和相關資源也有所整合，廿四

小時的熱線和各地區的婦女福利服務結合，婚姻暴力防治工作從宣導、救助、安置、訴諸法律等多管齊下，讓更多婦女得到人身保護，脫離暴力的威脅。

然而，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至今不到兩年的時間，許多防治工作仍在起步階段，未來建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路還很遠很長，因此本論文從現有防治工作探討，訪談第一線的婚姻暴力社工員，從她們的直接的工作接觸和實務經驗中，從公權力資源分配和運作的角度，分析家暴法通過以來，現有防治工作的發展，和仍有待加強的工作重點，以作為未來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決策者和服務者的參考，進而建構一個完備的婚姻暴力防治網絡，使婚姻暴力受害者投訴有門，使婚姻暴力事件的出現降至最低，使婚姻暴力的救援速度更快。

本論文實證資料以訪談記錄為主，對象包括台北市現有四個專職婚姻暴力防治服務工作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南港、龍山、大安、北區等四個中心，和家暴防治中心工作人員，訪問中探討了台北市現有的婚姻暴力防治服務工作的資源網絡、各種協助、保護受害人身心安全的管道。論文並從工作人員的第一線服務經驗，分析家暴法實施以來社工員在婚姻暴力服務工作執行上、和實務上，所面對的新挑戰和新難題。

## 英美兩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

幾十年來，婚姻暴力一直被我國社會認為是「家庭私事」，即

使受虐婦女遍及各個不同年紀、教育、社會階層，社會大眾對這個議題仍多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也因爲觀念的封閉，服務和防治工作遲遲無法展開，使得許多受害人只能私下轉求親友，甚至還可能求救無門，天天生活在恐懼中。不只是在台灣，即使在社會服務福利工作發展多年的歐美國家，婚姻暴力議題從家務事的層面被提升到社會問題的層面，也是近廿多年的事，英美等國約在一九七〇年代中以後，才陸續展開防治和服務工作，將婚姻暴力列入社會福利的新領域。

英國反男性暴力運動先驅首推成立於一九七五年的「全國婦女援助聯盟」(National Women's Aid Federation)。該聯盟成立後，即積極推動各種活動，舉出各種婚姻暴力的事例和統計數據，喚起大眾的關心，並向國會提出三項立法建議：(一)擴展救援工作；(二)將婚姻暴力視爲住宅問題，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庇護所；(三)立法界定責任歸屬，落實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讓後受虐婦女和其子女可以得到庇護，遠離暴力環境和加害人(Dobash and Dobash, 1992)。在「全國婦女援助聯盟」的積極推動下，英國於一九七六年立法通過了「家庭暴力法」(Domestic Violence and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ct) (Barron, 1990)。「一九七〇年再通過「住宅法」(Housing Act)，這是英國歷史上首次認定婦女如因婚姻暴力而無家可歸，可以享有住宅優先權，由地方行政機構負責安置。一九七八年英國又通過「家庭保安法」(Domestic Proceedings and Magistrates'

Courts Act)，規定婦女如因配偶施暴，可向保安法院申訴以公權力介入，防止對方繼續施暴(Charles, 2000)。

美國的婚姻暴力議題在一九七〇年代，也因婦女運動、民權運動，和兒童福利運動的風氣趨勢帶動下，而漸受到社會的重視。美國婚姻暴力防治倡導者認爲，婚姻暴力受害者也應和其它犯罪暴力受害者一樣，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法律權利。但由於美國採的是聯邦政治由地方各別立法，因此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全美國仍只有十七州提供保護令給受虐婦女，以公權力保護受害婦女，免於加害人繼續騷擾和虐待。美國雖早在一九七七年即成立「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但美國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才修改「兒童虐待法」(Child Abuse Act)，立法規定聯邦提供經費救援婚姻暴力受害者。從立法精神的角度來看，美國的作法，主要是將婚姻暴力列爲警政工作，而英國則是將婚姻受害者列入住宅和社會安全工作範圍，相較之下，英國的作法更有助於婦女離開加害人，建立個人獨立生活(Charles, 2000)。而從婦女運動參與政策立法的制度來分析，美國反婚姻暴力運動主要由婦女利益出發，以組成壓力團體的運作方式，從地方到中央，遊說各層級的立法機制，參與立法、修法(McGregor & Hopkins, 1991)。這種運作方式主要是以自由主義女性角度出發，以體制內改革，公權力介入的方式改善社會環境，以達到保障婦女人權的理想，台灣的反婚姻暴力工作發展基本上比較類似美國的例子。英國的作法則是以社會運動團體自主運作的方式來提供婚姻暴力救援資源，和立法機制

的互動關係較為薄弱 (Gelb, 1989)。

## 我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發展現況

目前台灣社會中，有多少婦女每天生活在暴力的陰影、生命威脅的恐慌中？根據「一九九八年台灣省婦女保護熱線的認知與運動調查報告」，台灣已婚婦女中，有十五%表示偶爾遭受丈夫毆打，二%的婦女表示經常被毆打。法務部統計，「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實施以來，至八十九年五月止，一年之間，據各地方法院統計，共有八六七三件民事保護令聲請事件的新收件數計。而八十九年一月至五月為止，各地法院共有四八〇件違反家暴法的刑事事件，共有三六六人因此而科刑（法務部，二〇〇〇）。另外，最早開辦婚姻暴力婦女服務工作的台北市社會局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平均每年接獲三〇一九通求助電話，而據婦女新知估計，台北市有一萬至一萬七千名受虐婦女。

反抗暴力侵害是婦女的基本人權之一，和歐美國家相似，我國的反婚姻暴力意識也是始於婦女團體的婚姻暴力的倡導和聲援。在民間婦女開始倡導之前，社會上的婚姻暴力事件多以單純刑事案件視之，如涉及人身傷害才由警政單位介入提起告訴。民國七十年代，在民間婦女團體如「婦女新知」的推動下，婦女服務工作逐漸成型，首先是由婦女新知等婦女團體成立女性問題熱線服務工作，提供婦女各種問題諮詢，在眾多投訴的個案中，婦女團體發現婚姻暴力的嚴重性，開始大力呼籲社會重視這個關係婦女人身安全的問

題。於是，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民國八十二年，將當時已成立四年的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從一般婦女服務工作改為「婚姻暴力危機處理中心」，專職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政府部門直接提供婚姻暴力防治服務的一大步。

北區婦女服務中心的工作是一個重要起步，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沒適當的法律支持，婚姻暴力事件仍只能以刑法處理，必要時將受害者以刑法起訴，對於通報、醫療、庇護等重要防治工作項目都只能零星個別執行，無法得以整合相關資源，加速救援婚暴受害者脫離暴力環境。民國八十年年代當時，各國已立法通過家庭暴力相關法令的國家已包括：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巴哈馬、千里達等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 (United Nations, 1995)。為了有效執行家暴防治工作，在各界期待和呼籲下，我國終於在民國八十七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並於八十八年六月正式實施，為我國國家暴防治工作立下一個重大里程碑。

在家暴法的立法下，各縣市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暴防治中心）也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正式成立，整合了台北市家暴（包括婚姻暴力）的防治工作的各項資源，成為婚姻暴力的防治工作網的核心單位，建立通報和救援系統，使婚姻暴力防治工作從此跨入新的紀元。

## 婚姻暴力、公權力和社會資源

家庭暴力在我國社會工作專業的解釋中，包括：兒童虐待、老



人虐待，和婚姻暴力等家庭結構中所發生暴力行為。受害者可能是家中任何一個成員，而以老弱婦孺居多。根據「家暴法」的定義，家庭成員指：配偶或前配偶，現為或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為或曾為四等親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家暴法第一章等二條）。從家暴法的界定而言，「婚姻暴力」被視為家庭暴力中的一環，雖以「婚姻」為名，但並不表示雙方一定有現存的婚姻關係或家庭關係。根據家暴法，「婚姻暴力」可以來自：配偶、前配偶、同居人、或前同居人、關係等曾同夫妻的伴侶或已分手的伴侶。雙方無論是否曾有，或現有正式婚姻關係，只要有暴力行為，均可以「婚姻暴力」視之，同時也適用「家暴法」的處置。

在我國現有的實證研究中，陳若璋（一九九二）發現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多有下列特質：自我評價低，和社會隔離，和娘家也多有聯繫，經濟和情緒依賴丈夫，不確定自己的需求等。周月清（一九九六）也引述美國華盛頓特區婦女虐待防治中心資料指出，受虐婦女因受到身體、精神和情緒的傷害，嚴重影響到她對人的信任，和對自己的自信心，對周圍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安全感。英國學者Charles（1995）指出，婚姻暴力雖存在每個階級族群，不同階級有不同社會資源，和其它社會福利所需一樣，中產階級的受虐婦女有自己的資源提供協助，社會資源也較多。以受虐婦女最立即需要的經濟救助和收容安置來說，中產階級婦女的出路就多。所以Charles認為，婚姻暴力的社會福利服務資源對中下階級的婦女幫助，遠重

要於對中產階級婦女的幫助。但Schlechter（1982）認為，個人資源或許因社會階級不同，但就精神支持和個人自信心的喪失和重建，任何階級的婦女卻都面臨一樣的難題。另外，因為中產階級婦女可以尋求自己的資源，找私人醫生診治，自己找律師出面，所以實際去報警處理，被公開出現報端的案例並不多見。因此許多中產階級婦女同樣也面臨婚姻暴力問題，但因為沒有被公開，而未受到重視。社會上因而仍存有迷思，以為婚姻暴力只存在中、下階層家庭而已（Rodriguez, 1988）。

從這些角度來看，公權力的介入對許多個人資源有限的非中產階級婦女而言尤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社會資源，她們的處境將更為孤立，情況也將更危急。周月清（一九九六）引述Dibble和Straus（1980）的研究指出，愈是下層的婦女愈不知如何尋求社會資源，也因此更容易受到虐待，主要因為施虐者知道婦女沒有資源或不知到那裡找資源，所以使他更加有恃無恐，為所欲為。所以周月清結論說，婦女受虐或無法脫離受虐關係，主要都和缺乏社會資源支持有關。

社會資源研究者分析（Gourash, 1978，引自周月清，一九九六），社會資源分為非正式和正式兩種，非正式資源包括個人家人和親友支持網絡。受虐婦女在私人網絡得不到有效支持時，或認為私人資源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時，才會轉而向正式資源包括專業機構和公權力機構如警察、法院等等求助（Gelles, 1976）。

而從資源使用的角度而言，台灣婚姻暴力的專業機構和公權力

單位，對任何階層的受虐婦女都具有保護作用。一來他們可以作為婦女的護身符，讓對方知道即使她的個人資源有限甚至可能家人也不支持，但她最終還是可以尋求法律保護，對施虐者有無形的嚇阻作用。第二，除了嚇阻以外，這些正式資源也的確是受虐婦女的重要保護傘，讓她們在最後關頭，私人介入無效時，以公權力介入，甚至核發保護令，讓施虐者無法再靠近受害婦女。

### 家暴法對社工員提供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衝擊

從以上這幾個角度，本論文以台北市家暴中心和四個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第一線參與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社工員的訪談結果為研究資料，從家庭暴力法實施以來對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正面衝擊，和未來防治工作挑戰兩個不同層面探討目前防治工作的得與失。

### 家暴法對防治工作的正面衝擊

#### 一、整合行政資源

在實務工作層面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在各縣市正式成立，使得防治工作有了統籌單位。以台北市來說，現有的婚姻暴力工作主要以家暴中心為主軸，再由行政區劃分，由四個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負責行政區內的個案。家暴中心設有廿四小時熱線，接到求助電話，或接到通報後，依受虐婦女所居住的行政區，交由就近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接案。婦女如需緊急庇護，則由庇護所暫時收容。另外家暴中心也負責來自警政單位、醫療單位等相關人員的通

報，聯絡社工員和受虐婦女服務。

台北市現有四家負責婚姻暴力工作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其中大安和龍山兩個中心為公辦民營機構，大安婦女中心由「新女性聯合會」承辦，龍山婦女中心由「勵馨基金會」承辦。其它兩個中心：北區婦女及南港婦女中心則為市政府所屬。市政府另外也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善牧會提供庇護所。

在觀念上，社工員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服務的資源，包括：資源分配規劃、受虐婦女需求和處境、社工員的工作和挑戰，未來防治工作的發展等。

#### 二、提升婦女需求的能見度

受虐婦女除了緊急庇護外，其它的需求在家暴法規範下，有一清楚歸類。包括：（一）法律需求：社工員接觸的個案主要以尋求法律協助為大宗，許多婦女想要瞭解自己的權益，如何蒐證、保障財產，子女的監護權、撫養費，如何申請保護令，如何求一個公道等等。一名社工員指出「我碰到的個案，許多還要求我們不要報警，否則對方會知道她來求助，會對她和子女不利。」四個婦女中心，目前都有法律諮詢服務，也開辦法律事務班。另有義務律師協助婦女處理法律訴訟等問題。但對許多受虐婦女來說，法律訴訟過程耗盡心力，也耗盡財力。一位社工員接到的案例，就是丈夫以各種方式和理由，提出對婦女的控告，使得這名受虐婦女疲於奔命，耗盡個人財產。（二）經濟和就業需求：大部分受虐婦女都沒有經

濟支援，就業經驗也很有限。在經濟協助上，目前社會局提供婦女緊急生活補助，每月約領一萬一千元，一次申請可領三個月。許多婦女會帶著小孩一起逃出來，社會局也提供庇護所供暫時居住。「大部分的婦女都沒有工作經驗，年齡也都已偏高，且多有在學子女。因此長期的就業輔導，和生活安置，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重點。畢竟庇護所只能短暫居留，而政府的經濟協助也有限。」未來，協助受虐婦女就業將是一個工作重點。

### 三、強化意識宣導

家庭暴力法通過後，無形中也提高了婚姻暴力的社會意識。上述所指的婚姻暴力紀錄片就是一個重要的宣導工具。社工員的工作經驗發現，大部分的婦女對婚姻暴力的觀念都不清楚，遭到暴力威脅時，第一個想到的多是求助警察。目前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依家暴法規定都設有家暴官，但派出所的警員才是實際接到報案，直接面對受虐婦女的第一線人員。這些基層警員的態度和處理方法，對婦女安全的確具重要關鍵性。如果警員將求助的受虐婦女草草打發，不僅將嚴重影響婦女接下來的求助意願，更使婦女又重回到暴力環境。

### 四、提升社工員角色

對許多受虐婦女而言，社工員像是一個朋友也像是一個家人，一個幫她們出面說話，找資源的人。「許多時候，婦女都很無助，

也沒有人出面幫她們說話，有社工員出面，情況就好一點。有時碰到警察態度不好，或是法官問話，讓她們很害怕，社工員如果也在場，婦女的膽子就們大一點，也比較放心。大部分的婦女都不是很有信心的人，也沒什麼社會地位，也許要有人幫她們說話，幫她們聲援，社工員就是一個代表。」家暴法是社工員為受虐婦女據理力爭權益，和執法機關協調的一個重要依據。有了家暴法的明文規定，社工員成為受虐婦女的第一線的倡導者。無形中，也提升了社工員在執行業務的權力和影響力。

因為各種因素，婚姻暴力救援過程是一個冗長的歷程，社工員對案主的鼓勵和不放棄，成了案主勇敢走出暴力的支持力量。一名資深社工員以一個自己處理的個案舉例說，「我有一個案主整整十年，才完全脫離丈夫的糾纏。而很多時候是，婦女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有時她們重回丈夫身邊，又逃了出來。看到我時，都向我抱歉。我都告訴她們，不要放棄求助，只要記得她們要找我時，我都會在那裏，我都不會拒絕她們把門關起來，這樣子就好。」

### 防治工作的挑戰

#### 一、無所不在的暴力威脅

相較於其它性質的社工員，從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社工員面對的挑戰尤為艱巨，尤其是無所不在的暴力威脅。為了保護求助婦女的安危，婚姻暴力的社工員和求助者的互動方式，不同一般個案關係，許多社工員都和婦女都有特定的聯絡方式。「如果不是我的

案主接電話，我都隨便說個號碼，假裝打錯電話，絕不留言。我如果說是她的朋友，或是同學，對方也會起疑，因為大部分的婦女都沒有朋友，也沒有同學會和她聯絡。」一個社工形容她和案主聯絡的緊張狀態。對於求助婦女，社工也儘量採取一種漸近的協助方式。一個社工說「有時我們追得太急，她們反而不敢來。所以幫助婦女下定決心是我們工作的最大挑戰。我常鼓勵她們寫日記藏起來，記下自己的心情和當天發生的事，也算是一種心理療傷的過程。」

除了婦女本人受到暴力威脅，有時社工自己也會受威脅。一名資深社工說：「我碰到過一個案主的先生知道我和他太太聯絡後，到處找我，恐嚇我，還到我上班的地方找我，寫信去我主管單位告我，嚴重影響我工作的情緒。」這些無形的恐懼和威脅對社工員的工作更是額外的負擔。現在家暴法雖已通過，但最終還是警察和法院才有執法力量，可以具體實現法律賦予婦女的權益。因此在執行家暴法的過程中，警政單位的協助和支持成了社工員保障婦女和自己人身安全的一大關鍵。

## 二、行政協調和支援

如上述所指，警政單位有執法力量，阻止施虐者的暴力行為，因此婚暴防治工作另一個挑戰就是一個多方行政單位的協調合作。在婦女求助的過程中，社工員是婦女在解脫暴力的過程中，一個最重要的聲援者和支持者，但社工員卻沒有判決婦女權益的權力（如

法官），也沒有執行保護婦女安全的公權力（如警察）。如果沒有各方人員的有效配合，即使社工員和婦女本身再努力，也無法使婦女得到法律保障，遠離暴力環境。

一名資深社工員明白指出，「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是個團隊工作，需要各方人力參與，警察、法官、醫療人員。子女就學、婦女就業，這些相關人員如有一個觀念薄弱，就會影響婦女求助的意願和協助的效果，社工員只是其中之一環，很難也無法獨立完成這項工作，但社工員卻是走在前面的一個。」

## 三、經費和人力

經費的困難也是婚姻暴力社工員共同面臨的困境，一名社工員形容說，「我們的工作需要有彈性應變的空間和能力，但法律限制很多。公家的規定也很多。比如說，有時候婦女身上一毛錢都沒有就逃出來，我們也要想辦法。有時甚至就先一、兩百元借用。但這畢竟不是辦法，我們也其實不應該這麼做。不過又想不出其它辦法。」而「人力不足」是所有社工員共同面臨的問題，平均每個社工員手上都有近百個個案的量，讓許多社工員在許多求助的婦女需求時，都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依個人主觀認定的緊急狀況，決定處理的順序。「我常常不曉得，是不是有人很需要我，而我不知道而沒有幫助到她。」一個社工員無奈的表示。

比較其它領域的社工員，婚姻暴力工作的社工員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在現有的資源下，每個社工員幾乎都是將時間、精力花在



個案處理上，很少再有餘力從事其它相關的資源發展和公共宣導。

## 結論

福利社會是個全民的事務，我國社會福利民間組織，受到社會環境和資源的限制，提供直接服務的民間機構數量有限，性質也以兒童福利為主，相對之下，婦女議題的發展時間較短，資源尤為短缺，因此許多婦女團體多集中心力在社會宣導和意識提升的工作上，如有個案，也多轉介公設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員作直接服務。以台北市資源來說，目前從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共有龍山、南港、大安、北區等四個中心，其中以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成立歷史最久，包括公辦公營和公辦民營兩種，都是由市政府編列預算執行，各有其優點和缺點。

公辦公營的機構，社工員由政府單位直接聘雇，因具公務員身分福利，人員流動較少，和案主建立關係的時間也較長，不會因社工員變動而使社工員和案主必需重新建立共識。但婚姻暴力工作不同於一般行政工作，如果沒有一定的使命感和專業的社工訓練，不僅工作執行困難，也很難有所成效。但在公家機構，社工員的派任主要以任用資格為考量，很難兼顧到工作人員的意願。少數的特例是訪談中一個社工員曾有婚姻暴力實習經驗，後來考上高考，也希望到婚姻暴力工作機構服職，而當年剛好一個機構也有出缺，這是一個少見的適才適用的例子。但這樣的例子畢竟不多見，所以許多從事婚姻暴力的公務員，不一定有相關的訓練，也不一定對婚姻暴

力工作的挑戰有心理準備。

而從公辦民營的角度來看，許多社工員的待遇因受限於經費，相較於公務員的待遇偏低許多，所以人員流動較大。但也因為在民間機構上班，資格限制較少，所以比較容易找到對婚姻暴力工作有訓練和認知的人。問題是公辦民營因是以承包方式執行業務，所以業務執行，完全受限於政府規定，無法自由發揮。而且每次承辦時間以兩年或三年為一期，如果下一期沒有得到委託，幾年來的工作成果也將結束，許多經驗無法傳承。另外因受限於委託的規範限制，許多機構成立的理想也無法在公辦民營架構中實現，這是許多民間機構面臨的兩難處境。一方面因經費來源困難，募款不易，所以公辦民營可以減輕許多經費壓力，但也因為經費來自他人，也因此失去設計和執行業務的主權，必需受到委託單位的業務監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由於家暴法執行的時間還不到兩年，目前能驗證的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績效仍很有效。相關研究也有所不足。如一個社工員所言「婚姻暴力防治工作是個價值的革命，以前以為是家裏的事，現在已成爲社會的事。」「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婦女被虐待而不知申訴、求助。」「許多人觀念上還認爲女人有丈夫，小孩有父親總比沒有好，而不去想丈夫天天打她，小孩也天天活在暴力中。」「婦女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這是一種成長。」社工員句句所言，都明指家暴法的宣導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婚姻暴力防治的工作可從不同層面探討，首先是全民性的觀念建立和政策宣導，讓社會大眾認知到婚姻暴力的法律性，讓更多婦

女體認自己的人身權益，而不再生活在暴力下而不知如何尋求保護。其次是提供受虐婦女的精神支持和社會支持。這些包括：社工員的個案協助，成長團體的支持，法律諮詢服務，婦女團體的聲援等等。最後也是迫切的是提供受虐婦女的立即切身服務，包括緊急庇護，協助婦女和其子女脫離暴力環境，提供經濟支援，讓婦女生活有著落，最終的目標則是幫助婦女找回對自己、對人、對家庭、和對生活的信心，協助婦女重建獨立的生活，解除暴力恐懼的陰影。今天台北市已形成一個由政府建立的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網，需要更多相關單位如法律、警察、醫療單位人員的認知和參與，使防治工作更能有效幫助受虐婦女脫離暴力環境，重新生活。

(本文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助理教授)

#### ◎參考書目：

陳若璋 一九九二 台灣婚姻暴力高危險因子之探討 台大社會學刊

#### 一一

周月清 一九九六 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 台北 巨

流圖書公司

Barron, J. (1990). Not Worth the Paper?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WAFE.

Charles, N. (1995). "Feminist politics,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states". *Sociological Review*, 43(4): 617-640.

Charles, N. (2000). *Feminism, the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Dobash & Dobash (1992).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Edwards, S.S.M. (1989). *Policing Domestic Violence: Women, the Law and the States*. London: Sage.

Gelb, J. (1989). *Feminism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McGregor, H. & Hopkins, A. (1991). *Working for Change: the Movemen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Allen & Unwin: Sydney, Australia.

Rodriguez, N. (1988). "Transcending bureaucracy: Feminist politics at a shelter for battered women". *Gender and Society* 2(2): 214-227.

Schechter, S. (1982). *Women and Male Violence: the Visions and Struggles of the Battered Women's Move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United Nations (1995). *The World's Women 1995*. New York: UN Publication.